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10 年 11 月（总第二十五期）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 2010. 11 —

E-mail: ias-fudan@yahoo.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目 录

目 录	2
一、学术成果	4
1. 邓正来、曼斯菲尔德等,《与施特劳斯学派相关的若干问题——与曼斯 菲尔德教授的对话》	4
2. 纳日碧力戈教授,《田野与自觉: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真回归》	4
3. 纳日碧力戈教授,《“原生态”还是“活生态”?》	5
4. 理查德·J·伯恩斯坦,《〈哈贝马斯与现代性〉导言》,孙国东译	5
二、学术讲座	6
1.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十):今日理论:批判性话语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6
2.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十一):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15
3.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十二):对西方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	23
4.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九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29
三、学术会议	32
1.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开通一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32
四、学术出访	40
1. 邓正来教授等应邀参加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高研院协办第一分会“关 于中国模式的探讨”	40
2. 邓正来教授到常熟理工学院讲学	41
3. 邓正来教授应邀到印度讲学	42
4. 纳日碧力戈教授担任 2010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主题发言评议人	43
5. 纳日碧力戈教授被聘为内蒙古大学客座教授并在该校进行系列演讲	43
6. 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内蒙古党校和内蒙古师范大学作专题讲座	44
7. 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广西民族大学作讲演	45
8.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在浙江大学进行学术讲座	47
9.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在清华大学进行学术讲座	47
10.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访问厦门大学并进行学术讲座	48

11.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作学术讲座...	49
五、学术来访	50
1. 福特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来访复旦高研院	50
六、学术信息	51
1.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在复旦高研院开设“政治学研究方法”课程	51

一、学术成果

1. 邓正来、曼斯菲尔德等，《与施特劳斯学派相关的若干问题——与曼斯菲尔德教授的对话》

载于徐戡选编，《古今之争与文明自觉：中国语境中的施特劳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130-151 页

【首 段】 邓等：曼斯菲尔德教授，您好！复旦大学的学子都很欢迎您到中国来，我们更是感到荣幸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与您进行一些学术讨论，当然主要是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波士顿环球报》2003 年 5 月 11 日的报道引用施特劳斯的一位弟子罗森的话说：“现在最信奉施特劳斯的地方是中国大陆！”我们相信您也一定听说了中国的施特劳斯‘热’。当然，也有许多中国学者不理解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始终是一个游离于西方主流学术之外的思想家，通识教育不是只有施特劳斯主张，古典政治哲学也不是唯有施特劳斯一条线索可循，甚至对现代性和历史主义的批判也不是只有施特劳斯一脉。我们以为，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至少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在此之前，中国学者所熟知的乃是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便在中国广为传播的萨拜因所主张的政治理论史研究范式，而施特劳斯对古典文本的“虔诚”关注为中国学者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二是引介施特劳斯派思想的两位学者刘小枫和甘阳是中国的知名学者，他们的作用不可小视。三是施特劳斯派对左右两派思想的批判以及对韦伯的批判可以为反思和检审中国学界 90 年代的两大趋势提供某种“极端”的视角，而这就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及其与新左派的争论，以及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观在中国的盛行。

2. 纳日碧力戈教授，《田野与自觉：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真回归》

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5），46-47 页

【首 段】 人类学者不做田野不行；人类学学者没有自觉也不行。林耀华先生三上大凉山；费孝通先生行行重行行。他们是田野工作的楷模，是学科反思的榜样。他们毕生探索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之路，探索表征本土知识和民间智慧的方法，建设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寻求有益于众生的道路。

3. 纳日碧力戈教授,《“原生态”还是“活生态”?》

载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0, 3(2), 14-17页

【摘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 财富资本的累积, 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 也给人类社会关系带来了改变。人们在思考的同时, 一部分人开始向往“原生态”, 还有一部分人试图开发“原生态”。实际上“原生态”是人们所想象出来的一种生态, 真正存在的是“活生态”。

【关键词】: 原生态, 活生态, 感觉生态

4. 理查德·J·伯恩斯坦,《〈哈贝马斯与现代性〉导言》, 孙国东译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2010(32), 复旦大学出版社, 186-205页

【首段】: 1969年, 欧洲文化生活最具见解的评论家之一乔治·里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写下了如下有关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评论:

“对于经由马克思(Marx)、黑格尔(Hegel)和欧洲形而上学传统的更深奥渊源而在从科学逻辑到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领域里纵横捭阖的一名学者的著作, 我们不能放在一起轻易作出评价……[在]其大多数同僚在某个领域的一个角落艰辛耕耘的时代, 他却使自己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成为整个领域的主人。其中, 没有任何削角细分(corner-cutting), 也不存在任何驾轻就熟地回避难题, 或欺骗性地阐述未经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无论是对波普尔(Popper)的反驳, 对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实用主义的剖析, 对谢林(Schelling)形而上学中世纪先驱的探究, 抑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更新, 他都同样出神入化地掌握材料, 并以其令人羡慕的才华阐明其中复杂的逻辑疑难。他似乎天生就具有一种将最困难的资料融会贯通并使之重新成为有序整体的能力。”

二、学术讲座

1.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十）：今日理论：批判性话语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2010年11月7日下午2:30,“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十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本期席明纳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联合主办,研讨的主题为“今日理论:批判性话语面对的机遇与挑战(Theory Toda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Critical Discourse)”。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 Susan Buck-Morss 教授,高研院双聘教授、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系主任、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旭东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高研院驻院教授 Philippe Schmitter 以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刘清平、陈润华、孙国东、林曦参加了本期席明纳。



邓正来教授首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以及本期席明纳活动的由来和目的,并邀请张旭东教授和 Susan Buck-Morss 教授做主题发言。与会学者们围绕着两位教授的发言展开了对话。

什么是理论?

张旭东教授首先以提纲的方式提出“什么是理论”的问题。他从八个方面谈



了他对“理论”的理解:(1)理论是主体思想的介入,即介入现实、介入文本、介入知识话语,其目的是为了引入一种否定性的、批判性的并且最终是内在于历史环境之中的生产性和政治性的运动。(2)理论是一系列概念性的、文本批评性的(literary-critical)运作,从而使上述过程得以持续,并将

符号、意向、事件和叙事投入到那种运动之中。(3)理论虽然是概念性的,但是因为有主体思想的介入就需要公开承认自己是意识形态的,包含偏见的。它不是中立的,而是有自己的关切在其中。(4)理论处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之中,它是用普遍性的方式思考特殊的东西,同时也是用特殊性的方式思考普遍的东西,这正是理论的张力所在。(5)理论是要介入一个劳动生产的过程,它最终是物质性的,但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是审美式的、抽象式的、概念式的,它是要将自身置于客观实在的内部来找寻,发现和界定,甚至改变现实关系。这使得理论又是实践的,没有理论的实践完全不同于有理论的实践,在理论内部始终存在着那种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辩证关系。(6)根据法国哲学家 Allan Badiou 的观点,理论是由自己界定自己,而不是由传统界定自己,它在终极意义上是突发事件。(7)理论是一种具有个人性的写作和思想的方式,它聚合于哲学与诗、艺术与阐释、理论与实践之间。(8)理论不是理论本身:只有与实践相关联,才有理论。

Susan 教授则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话说明自己对理论的见解:首先,阿多诺指出,在主客体的辩证关系中,他将优先性给予客体,在理论的日常实践中,这意味着外在物质环境和历史特征要远远大于人类心智的观念,而我们总是在尝试理解我们无法完全掌握的情境。阿多诺的另一个观点是:客观事物不会完全进入我们的理解,这就意味着我们从未完全将我们的处境概念化。



然而, Philippe Schmitter 教授从自己做政治学研究的经验对张教授所主张的理论的普遍性和批判性提出质疑:政治学理论中的普遍性是否存在?如果是在张教授意义上的普世主义的理论者,该对以前的理论持何种态度?政治史究竟是理论的一部分,还是作理论思考或成为理论家之前的必要准备? Schmitter 教授认为,他所能

接受的是与政治理论的核心部分保持一致，使之具有连续性，并且仅仅只有批判性的学术研究只是理论的边缘部分，如果无法使这种政治理论终结，就应当尽力与之保持一致。

在回应 Schmitter 教授的质疑时，张旭东教授举出普世主义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前现代的文化普世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普世主义，是因为特殊性都努力挣脱自己是特殊的事实，进而主张自己的普遍性。就像古代中国将自己视为天下的中心一样，这种普遍性扩大了自己的优势，甚至凌驾于其它特殊性之上；另一种普世主义则是因为他们想要将他们已熟知的经验强加到其它情境上，这就形成了一种有关“特殊的普遍性”的约定。

Susan 教授则对“否认政治理论的普遍性”给出了一种技巧性的回应：我们是在普遍地描述特殊的研究对象和事件。

Schmitter 教授并不满足于两位教授的回应。在他看来，基于 Susan 教授在理论中赋予对象客观性以优先性，能够掌握对象的概念恰恰不是那些普遍性的概念，而是受到不同情境约束的特殊概念；同时，理论家最感兴趣的是参与到政治理论活动之中，并且对他所经验的政治活动进行理论化，不需要置身于普世主义的宏大背景之下。

张教授对 Schmitter 教授断定宏大叙事的终结做出了回应。他认为，问题在于这种终结并未触及最宏大的叙事，即对资本主义的宏大叙事，这是因为即使已经有那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但人们仍然还会对资本主义提出问题，不可避免地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这不是社会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今日理论何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理论已死”的主张充斥着整个西方思想界。这主要表现在：那些由理论话语建构起来的理论，例如文化研究、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符号学、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都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主义（Politism）、资本

研究以及在技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或“身份政治”。为了回应“理论已死”的主张，张旭东教授对可以生发理论的社会文化空间进行了分殊：（1）在高峰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和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生发的新感性形式和生活方式为生发新的概念提供前提；（2）传统、典范和常规在反对新事物时会产生一种理论张力，例如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右翼革命时产生的新哲学，和新自由主义，新国学等，它们可以生发新传统来抵抗新形式；（3）新技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带来新的理论阐释空间和理论生产力；（4）在社会革命和变革中出现的新政治主体，无论他们是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还是性别的，对各种历史事件，如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持续思考会产生新的理论空间；（5）那些让人无法承受的压抑、停滞和黑暗也会产生理论；（6）新的帝国秩序，新的主权方式和各种普遍性主张，例如取消阶级斗争，维护永久和平等，会产生新的理论；（7）由那种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感所产生的极端立场，正如在美国的白人民兵和茶党运动中体现的一样，会带来理论思考；（8）新的人际生活方式，对身体的感觉和对心灵的理解也会生发新的理论空间。

基于张教授对上述问题的建议，Susan 教授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出发，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进行了批判。福山主张的历史终点实际上是民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终结，因此不存在最终的进化过程。同时，Susan 教授认为张教授所质疑的那种批判理论仅限于两个欧洲国家——



德国和法国。但他们所产生的理论不能代表人类的思想，同时不能认为他们是准确描述现实的。在西方，理论在当下正在衰落，因为西方学者把他们的理论视为一种自给自足的话语，因而认为它会不断发展至永久并且不再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



Schmitter 教授认为，理论终结之因是普遍的视角并不有效，使得没有人会相信它，因为它们不足以引导人们预见经验层面的行为，使得人们在从理论的想象出发

和从现实的特殊愿望出发之间失去了平衡。

张旭东教授则指出，即使理论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理论的政治性（通过理论解决价值冲突）、生产性（经由理论来分析在“我”与已变化了的作为客体的“我”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和总体性（按照马克思对关系的看法，总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所有部分都可以是错的，但是总体则是辩证的、思维性的，在此时牵涉到了理论）表明它仍然是有价值的。

怎样做理论分析？

鉴于当下西方理论衰落的教训，Susan 对“如何做理论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如果没有其它选择，必须要进行批判的自我反思，而不是仅仅研究已有的传统和已存在的思想。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今日的理论家们必须要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结论，应该把经验地理解现实视为自己进行理论思考的主要目的；而且，理论不仅仅限于描述已存在的事实，还要保留这样一种想象力，使得经济增长和生产力适合于改善人类境况，这样就排除了异化问题，以及与传统和文化价值分裂的问题。这也是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的差异。



Schmitter 教授则对作理论分析的方法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如果要成为理论家，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与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论传统保持连续，然后使一种批判的立场适应于这种传统；或者更好的是成为这样的批判理论家——他已了解了那种理论核心，但是更希望在其它学科或者其他国家找到灵感来形成自己的批判视角。

针对 Susan 教授的理论分析方法，吕新雨教授则借鉴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观点对理论分析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进行了阐述。根据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特殊性是目的，普遍性进行分析的工具，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必定要在充分分析自己特殊性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确定自己的政治立场。



Susan 教授则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斯·韦伯的工具性方法进行了批判。首先是“一个不合理整体的合理性”。例如美国要摧毁世界十次因为苏联要摧毁世界 8 次，根据工具性方法，这是合理的，但跳出这种工具理性来思考，这整个计划是不合理的，由此看来有必要存在超越工具性方法的理论思维。其次是系统的工具方法，例如各种经济模型，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而工具性方法的目标也许是特殊的，但也许是不合理的。

Schmitter 教授认为，不管怎样，如果要做研究最重要的是以什么作为起点，理论家和马克斯·韦伯的差异正在于起点不同：前者以可能的或理念上的存在或历史的、传统的模型为起点，然后从中延伸出各种概念进行研究；而后者则首先尝试找到政治家们或其它行为者心理行为中的模式，然后专注于研究他们描述自己行为的语言和所持有的意向，从一种工具性的视角完成研究。

Susan 教授则认为，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起点，关键在于为谁生产知识，是为了改善世界，还是为了其它原因。



张旭东教授也对 Schmitter 教授“以起点作为区分理论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关键”提出异议：根据理论的总体性，通过总体看整体，通过整体看总体，起点对于研究的意义并不重要。

西方世界正在衰落？

Susan 教授确信：西方世界正在衰落，这不是逻辑的必然性，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结果，具体而言是对由消费社会的崩溃引起的、已存在的物质上的不安全性产生的忧虑造成的。



Schmitter 教授对西方世界的衰落表示怀疑，他相当同意 Susan 对进化的目的论批判，但同时如果把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看，则看不到西方世界正在衰落。



Susan 教授要求 Schmitter 教授对当下西方受到良好保护的工人，与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的工人相比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的原因作出解释。Schmitter 教授解释说，在相当大程度上，资本主义优良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工资制度仍然会促进高收入工人群体素质的提高，欧洲工人不及的是日本工人，而不是中国工人。他之所以做出西方世界不会衰落的判定，是因为事实上资本主义民主是成功的，这是以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模式成功适用于其他国家为标志的。

Susan 教授仍以“马歇尔计划”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无法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向世界推行为例坚持西方世界的衰落，即西方的经济体系在当下已不占优势。

从《资本论》第一、二卷中能找到什么答案？

Susan 教授以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 David Harvey 在其著作 *the Limits to Capital* 中成功运用马克思的理论预见到



金融危机为例指出，如果想要在当下成为一个真正的批判理论家，就应该从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一、二卷汲取养分。从这一点出发，Susan 教授对把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视为不相关的主张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规律之下，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形式仍然有一种内在关联。

而 Schmitter 教授则向 Susan 教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相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今天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因为马克思解释的资本主义与今日的资本主义不同，比如基于两极分化的阶级对立，所以，我们不得不对用马克思的理论假设解释将来的政治深表怀疑。诚然，理论要对自身进行批判性反思，但是回到马

克思的理论去寻找答案而不是批判地思考自身来寻找回应当今资本主义问题的概念和本质，这是矛盾的。同时，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的民主政治的确有关，但这种关系并不必然作为一种因果关系而持久存在，因为一些民主程度相当发达的国家，例如瑞士，在欧洲则是贫穷国家。

Susan 教授则要求 Schmitter 教授对当下“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两极分化现象做出解释。Schmitter 认为这种两极分化并不是基于阶级产生的，处于两极分化的人们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解释，而且这种两极分化仅仅存在于收入中，而不在政治之中。Susan 教授又举出了 David harvey 为例（即他用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方式分析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资本危机，而美国不懂马克思理论的经济学家根本没有看到这种危机的存在）来反驳 Schmitter 教授的主张。

张旭东教授认为，要理解资本主义危机的概念，需要参考马克思的理论。即使是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也是将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危机转到政治领域的资本主义危机，进而进入到价值领域成为合法性危机：我们不再相信任何价值。同时，根据 David Harvey 的著作，我们仍然处在像马克思所描述的同个危机之中。

Schmitter 教授同意资本主义会产生不同的危机，虽然一般很难理解为何在经济分歧越来越大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越来越一体化，但是我们仍然在现

实中会看到民主政治一体化的平台正在形成。因此，即使存在政治的危机，它们也是由政治自己产生的：它不牵涉到资本主义，而是政治内部的矛盾。

顾肃教授则通过提出“资本主义的问题究竟是理论的问题还是实践的问题”来质疑 Susan 教授回到马克思寻找答案的做法。Susan 教授对此做出的回应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值得借鉴的。卢卡奇曾说过：“即使马克思的预言都是假的，但他的辩证法也是正确的”。理论分析和被分析的现实是交融在一起的，如果仅用理论模型去分析经济问题，不会对它产生任何效果；而马克思提出的辩证法则将这种干预赋予理论，使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



结 语



综上所述，此次席明纳是在社会科学研究者与理论研究者之间进行的，旨在澄清“理论与现实”之间辩证关系的一场真正的学术对话。但正如邓正来教授所指出的，无论对于哪一方来讲，都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在人类支配地球的短时间内，唯独人依靠理性把地球摧毁几百次。到底是整体的人出了问题？还是人的什么部分出了问题？到底什么东西是更符合人性的还是更符合人和地球的？而且，正如邓正来教授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尤其需要理论研究者正视的问题是：人都在正常地生活，那些“左派”、“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活得不像人”，但到底是这种批判更符合人性，还是那些人的正常生活更符合人性，这是值得深思的。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王卓娅 文)

2.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十一）：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2010年11月23日下午2:30,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十一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本期席明纳研讨的主题为“社会科学基础范式”,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教授担任主讲嘉宾。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当代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导师、



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副主任曹晋教授,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周旺博士以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纳日碧力戈教授、孙国东博士、刘清平教授、吴冠军博士、顾肃教授和林曦博士参加了本期席明纳。

邓正来教授首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然后请唐世平教授先做发言。与会学者围绕唐教授的发言进行了深入研讨。

主题发言

唐世平教授首先介绍了其论题的由来:他试图去克服自己对各个社会科学学派的敬畏,崇拜和疑惑,寻找到11个社会科学基础范式,为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局面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解视角:首先分析社会科学中不同的“学派”的长处和短处,然而不宣称会有统一的社会科学;其次为社会科学中不同“学派”之间更加有机的综合(*organic synthesis*)奠定一个基础。

基于上述意图,唐教授将自己的核心观点归纳为:首先在我们把社会科学中的所有的“学派”肢解到只剩下骨头后,整个社会科学只有11个基础范式,其中九个基石性的范式(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和反社会化,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两个整合性范式(社会系统范式和社会进化范式);其次,唐老师以“手电筒”之喻说明这11个范式的功效:这11个基础范式就好比是个11手电筒,用他们能够照亮人类社会的一些不同侧面。但是,除了社会进化范式在其最完备的时候能够将其他的10个基础范

式都整合起来之外，这些范式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照亮人类社会的一个有限方面；社会科学中所有的“学派”都可以被“还原”成这些 11 个基础范式的不同组合。这些不同的组合决定了这些“学派”或“主义”的根本分歧，以及它们在理解或解释不同社会事实时呈现的长处或短处。

在开始具体解释 11 个基础范式之前，唐教授指出了他描述这 11 个基础范式时所遵循的规则：首先，基于他对“本体论先于认识论，认识论先于方法论”的信念，主要关注 11 个范式的本体论问题及其认识论问题；其次在描述诸范式时需要明确提出某一个社会力量相对另一个社会力量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比重以及由其决定的认识论的优先性/比重，以说明先用哪个范式来照亮社会事实，并且当发现拥有优先性的范式不足以解释/理解一个社会事实时，再引入其它范式，包括没有优先性的范式来先照亮社会事实。在他看来，那些忽略了拥有本体论上优先性的范式理论一定从根本上是有严重缺陷的，无论它综合了多少缺乏本体论优先性的范式，因为它们无法解释为何某些范式比另外一些范式对于理解人类社会更加不可或缺。然后为了给出这些基础范式明晰和精确的定义，他用最纯粹的形式来给出这些基础范式的核心假定，虽然看起来极端以至于站不住脚，但是却能有力地证明，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必须把不同的范式有机地综合起来。



接下来，基于社会理论中的人性假设，唐教授区分出人性的三种基础范式：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范式和反社会化范式；基于本体论层次上的基本事实抑或人类社会中一些根本性的力量，唐教授采用二分法区分出三组基础范式对，这三组基础范式是：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源自前七种范式的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以便于分别对它们做出本体论优先性判定。

在描述了 11 种范式的基本构架后，唐教授以表格的形式表明社会科学中一些为大家所熟悉的学派，如早期社会学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方法，以及国际关系学的实在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是上述 11 种范式的组合。

表 1: 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第一维度: 物质和观念	第二维度: 个体和群体	第三维度: 行为的驱动力, 三个层次	第四维度: 和谐与冲突
本体论优先性 较少的范式	观念主义	集体主义	反社会化	和谐范式
			社会化	
具有本体论 优先性的范式	物质主义	个体主义	生物进化决定论	冲突范式

表 2 社会学的三大学派

	功能主义	马克思主义	韦伯主义
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主要是观念主义	更多是物质主义，但也强调阶级意识、意识形态	更多是物质主义，但也强调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即把社会当作有机体）	集体主义（即把阶级当作基本的行动者）	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
人性： 1. 生物进化 2. 社会化 3. 反社会化	只有社会化	大部分是反社会化（如异化、矛盾、冲突），暗含生物进化	社会化和反社会化，暗含生物进化
冲突与和谐	主要是和谐	主要是冲突，但也强调阶级内部的和谐	主要是冲突，但也有和谐
社会系统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系统的？	非常有限，因为遗漏过多基石范式	相当有限，因为遗漏过多基石范式	三个学派中最好的，因为整合了大多数基石范式
社会进化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进化的？	反进化：系统不能改变	半进化：冲突引致变化	半进化：冲突引致变化

表 3 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选择理论 (政治学和社会学)
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主要是物质主义	主要是物质主义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纯个体主义	纯个体主义
人性：	包括非常有限的生物进化和社会化，不包括反社会化	包括非常有限的生物进化和社会化，不包括反社会化

1. 生物进化		
2. 社会化		
3. 反社会化		
冲突与和谐	主要是和谐，冲突非常有限	与冲突、和谐相容
社会系统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系统的？	非常有限，因为遗漏过多 基石范式	非常有限，因为遗漏过多 基石范式
社会进化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进化的？	伪进化：向均衡靠拢	伪进化：向均衡靠拢

争辩与讨论



林曦博士在基本梳理唐教授 11 个范式的划分方式之后指出，虽然教授意在以此来分析不同学派，厘清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用由不同的逻辑链条得出的 11 个范式看不同学派的论证，如何保证这种“看”不发生断裂？

唐教授认为林曦博士提出的问题恰好印证了自己所提出的“综合范式”的诉求，而且“走向综合”是贯穿整个文章的主题，未有任何断裂，同时 11 个范式是在肢解各个学派的理论之后通过归纳的方法找到的，也是穷尽了的。

纳日碧力戈教授认为唐教授的 11 个范式仅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建议唐教授从生命的角度出发将人与其它生物，甚至与非生物的关联纳入其理论视域中。唐教授认为自己所讨论的社会体系已包含了非人类的生物，以及由人类思想创造的产物，如机器人，各种理论等等。纳日



教授指出不同语言、不同世界观会具有不同的本体论，西方的社会进化论是否就

是唯一确定的社会认知模式，还是有其它的认知模式？而后者就使得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接受一种社会认知模式，而是要作出选择。唐教授认为面临做出选择的不是本体论的问题，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在指出自己所持有的唯一的本体论立场之后，唐教授表明自己支持本体论的绝对主义，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



随后有参与者希望唐教授能对社会进化范式与历史学、政治科学的发生学（genetive）的差异发表观点，并且质疑以“内生推动”为特征的社会进化机制和社会系统论的解释力。唐教授首先针对第二个问题指出，在理解一个社会事实时，赋予某一个力量/实体更多的解释力是一个实证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针对第二个问题，唐教授以“survival of the fitter”来取代“survival of the fittest”表明将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来理解社会进化是偏见。

孙国东博士对唐教授 11 个基础范式有无统一的分类标准、是否违背形式逻辑规则提出质疑。并且认为，这种研究的意义何在？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还是只是一种化约主义的理论把握方式？如果是后者，他会不会引导学生或读者对西方理论的脸谱



化、标签式的简单化把握？唐教授认为，关于是否具有研究意义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理论的被认可需要长期的检验，这也是科学探究的特征。



曹晋教授向唐教授建议：用“社会进程的变动性”比“社会进化”更恰当，不会固守于某种范式来观察社会现实。她还指出，由于唐教授的研究关注范式，但却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更有意义的是否是：立足中国社会现实，来讨论中国的社会科学范式？唐教授认为自己具有高度的问题

意识,并且自己所作的研究也是在提供解决问题——给出照亮社会事实的手电筒——的办法。同时自己的研究不是停留在方法论上的,而更多是本体论的。在进行社会研究时,不可避免会使用到范式,这也是自己研究所要揭示的主题。理解社会事实本身背后的东西是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但确实会因为认识论的视角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观点,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会达到一定真实的理解。社会进化和社会变动性是不同的,变化是被普遍承认的,但是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则是社会进化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刘清平教授和顾肃教授认为唐教授在简单照亮社会事实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价值和本体论承诺问题,也许这些因为价值问题和本体论承诺受到争议的范式归类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唐教授则回应说,自己完全不排斥范式研究中的价值问题和

本体论承诺问题,并且已在回答前面问题时指出自己是本体论上的绝对主义者和价值判断上的相对主义者。但他进一步指出,对价值问题和本体论承诺问题的回答是否完善或许又与对这些范式的选择取舍相关。



刘建军教授指出了唐教授研究的重要价值:关注社会事实。同时刘教授引用反对用范式研究社会科学的西方学者的观点对唐教授的研究做出批判:社会科学没有范式,范式会将社会科学肢解,社会科学有的只是杂交,这就是说,只有概念的履行、法的选择和视角的汇聚,没有范式。唐教授借用生物学的“杂交”

概念作出了一个有趣的反驳:先要有基因才能有杂交,所以还是要肢解到最基本的因素(例如范式),才有意义。



陈周旺博士指出，所谓的 11 个范式不是并列的，不能同时作为基石而存在。何况 11 个范式并未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它们没有讨论“历史主义”，而且人在社会之中，在研究社会时个人的位置在哪里？针对陈老师的质疑，唐教授指出，在自己的研究系统中可确定本体论的优先性。社会进化范式远远好过历史主义并且会覆盖仅对社会历史进化做出线性解释的历史主义。站在科学实在论的基础上，唐教授认为，独立于科学研究客观的社会机制是可能的。



总结与回应

邓正来教授对席明纳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唐教授的研究为我们研究社会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根据 11 个范式向我们揭示出各个社会科学学派的局限性，但是问题在于：唐教授作出了这样一种假设，即较好的理论或者是最好的理论应该至少囊括这 11 种范式，在这样的理论背后所隐藏的预设是：理论的好坏与研究者没有关系。揭示社会科学的 11 个范式，怎么可能甩掉研究者的立场，尤其是研究者背后的意识形态承诺：即使出身相同的学者，他们所处的位置，对“手电筒”的选择是不一样的，这是科学主义者要直面的问题。而且，这 11 个范式并未穷尽，比如说布迪厄所讲的“关系主义”，冲突—和谐范式可以还原到它吗？



唐教授承认邓老师对自己研究理论的有力批判，并且回应说，他的研究不是要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事实上他所承认的科学实在主义被他称为“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或“后自然主义”（post-naturalism）。但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有这样的共性：

追求对事实背后的理解。此外，唐教授承认，用什么范式去研究社会是价值判断的问题，但是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研究者在特定时刻的偏见会在长期的探究中被抛弃。

最后，邓教授对唐世平教授的研究论题和精彩发言表示感谢。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卓娅/文)

3.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十二）：对西方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

2010年11月25日下午2:30，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十二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期席明纳的主题为“对西方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由复旦高研院驻院教授、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欧洲大学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教授研究员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复旦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吴冠军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担任座谈嘉宾。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当代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担任了本次席明纳的主持人。他首先向在场的师生介绍了本期席明纳的嘉宾和讨论主题，然后邀请菲利普·施密特教授围绕“对西方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一题做出了主题发言。

反思七大争议命题

施密特教授尖锐地指出，在西方的政治学界中，存在着一种“美国优势论”的观点(notion of American superiority)。这种观点将世界政治学界划分为三

股力量，最首要的是美国政治学，扮演着教练、守门员、前锋、裁判员的重要角色；欧洲政治学占据着中场位置，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学只是板凳球员；整个政治学界都将最终接受、沿用美国政治学的概念、假设和研究方法。施密特教授明确表示，这种“美国优势”的现状给政治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世界政治科学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被“美国化”。为此，施密特教授对基于“美国优势论”的七个典型命题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1.趋同性命题（The Convergence Thesis）。该命题认为，伴随着全球化，世界政治学界在概念、假设和方法的使用上将日益趋同，原有的国家、地区性差异将逐渐消失。施密特教授认为，命题中的因变量“全球化”的作用无可厚非，但是“全球化必然导致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趋同”这一点值得商榷。施密特教授指出，类似于市场竞争，为了制胜，商家不是简单地模仿竞争者，也会发掘、发展其与众不同的长处。对此，施密特教授用欧洲等地政治科学的发展新趋向做出了旁证。

2.不对称性命题（The Asymmetry Thesis）。根据该命题，政治科学的标准、规范和创新成果大多来自“领头羊”美国政治学界，其他国家一般都是“被普及”的角色。施密特教授指出，近期的数据表明，世界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正在迅速地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现在，越来越多主修政治学专业的欧洲学生倾向于去欧洲其他国家留学深造，美国不再是其首选。施密特教授认为，如果从对政治学的“消费”（consumption）角度、而非单从“产出”（production）来考量的话，欧洲并不落后于美国——美国政治科学的“产出”主要是被本专业学科所“消费”，而在欧洲，则是为更广阔的公共知识领域所“消费”，这点可以从美国与欧洲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就业趋向上体现出来。

3.相继性命题（The Sequential Thesis）。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政治学的概念、假设和方法遵循着这样的传播路径：首先，概念、假设和方法发端于美国，而后影响到北欧和南欧，最后传播到世界其他外围地区。施密特教授指出，在传播过程中，美国政治学会遇到试图打破其“霸权控制”（hegemonic grip）的“区域性抵抗”（regional resistance）。比如，在欧洲地区，一些地区性的政治学家团

体纷纷建立。施密特教授认为，现在来判断这种政治学“区域化”（regionalization）的努力能否成功对抗政治学“美国化”还为时尚早；但是，在欧洲大陆为欧洲的政治学人才创建一个跨国界的“市场”，是对抗美国政治学“霸权控制”的必要举措。

4. 专业化命题（The Professionalization Thesis）。根据该命题，政治科学的规范（即应如何进行政治科学研究）由美国政治学界制定，继而为其他“外围”地区所采纳、遵守；任何拒绝、抵制政治学规范的学者在求职、提升和学术发展上将会连连碰壁。施密特教授指出，政治学专业化的趋势毋庸置疑。但是该命题的问题在于，它认为政治学专业化的规范与标准现在和未来都是由美国政治学界来设定的，其他地区会“愉快”且“毫无怨言”地接受。事实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学者对此并非甘心情愿，而且是完全有能力抵制的。

5. 效率命题（The Efficiency Thesis）。即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能够使政治学取得高效发展。施密特教授指出，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事实上，美国政治学界与欧洲政治学界的内部竞争态势十分不同：美国的政治学者之间和研究机构间的竞争通常非常残酷，而在欧洲则通常表现为相对温和的“联合垄断”的形式（cartel-like fashion）。

6. 普适性命题（The Universality Thesis）。该命题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文化伴随其传播越来越具有普适性；因而，美国的政治学也越来越具有普适性，这使得学者可以在不懂外语、未进行田野调查的情况下对别国进行研究。施密特教授认为，美国的政治学界对自身的认识具有某种分裂性：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深信“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而另一方面又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普适性很有自信。通过对若干国家的政治学期刊4年中发表情况的比较分析，施密特教授得出结论，美国的政治科学在“普适性”这一问题上并没有特殊的发言权，而且其概念、假设等往往具有地区性和一定的狭隘性。

7. 非历史性命题（The Ahistoricity Thesis）。基于“普适性”的假设，主张“美国优势论”的学者在研究中往往不重视时空因素的影响，美国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就是突出代表。施密特教授认为，一国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文化和行为因素具有重要作用，政治学者应该对其进行“解释”（explain），而不是将其“解释掉”（explain away）。

通过对以上七大命题的反思，施密特教授指出，美国的政治科学并不能担当起“全球化”（globalize）世界政治学的角色。来自美国业内和国外的批判与反思有助于打破现有的“美国优势论”、将美国政治学放置到它合适应有的地位上。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所谈论的“政治全球化”才有可能做到名副其实。

“我们不需要过于悲观，但也必须有不满和批判”

唐世平教授对施密特教授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反思给予了肯定。他指出，



出，全球化不会带来政治科学的美国化，但是人们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担忧？对此，唐世平教授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在的一些地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方法论驱向”（methodology-driven）的研究取向，完全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来对研究进行设定和评判，而美国的方法论研究又较为先进，如此就出现了“政治科学美国化”的担忧。唐教授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其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社会问题、社会事实；这种“方法论驱向”的研究取向完全错置了本末关系。对此，唐世平教授提出，社会科学学者应该从社会问题、社会事实出发来进行研究，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所谓的“美国化的社会科学”（Americanized social science）的误区。

但是，唐世平教授进一步指出，强调“社会问题导向”的研究取向并不意味着就要抛弃方法论。他指出，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概念、假设和方法都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正确地把握和使用工具能够极大推进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唐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学，政治理论和政治史研究相对成熟，但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较弱；而这部分的研究是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支持的。针对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唐教授认为，“我们不需要过于悲观，但也必须有不满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进步。”

施密特教授非常赞同唐世平教授关于方法论与政治学专业化二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他指出，美国的主流政治学界存在着规范性理论与经验性理论二元对立的现状。以“普适性命题”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科学终将美国化”的论调与此密不可分。施密特教授补充道，现在美国的政治科学正在逐渐意识到这种割裂的危险，他希望中国的政治科学在发展中能够以此为鉴，避免覆辙重蹈。



“政治科学化”与中国问题研究

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就“政治学科学化”在中西方的社会—政治结构基础的差异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政治学科学化之路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政治学界取得较大发展，与西方社会基于基督教神学背景的“价值一元论”密不可分。我们一般都把“价值多元”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当然命题接受下来；但事实上，在西方宪政民主起源阶段（特别是在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型时期），真正起奠基作用的恰恰是“价值一元论”。这种“价值一元论”将“上帝”置于真理和价值的最高判准地位，相对上帝的普罗众生（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所拥有的只是“意见”。正是有了这种“价值一元论”的政治神学预设，众生之间的政治人



格“平等”才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有了政治人格上的“平等”，以“数人头”的方式决策并定期更换政治领袖和政府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制度）才可以建立起来。进一步言之，也正因为有了社会成员政治人格上的“平等”，以“数人头”的方式研究政治运行才有了某种“科学”基础——这正是“定量研究”可以在西方推

行的深层社会—政治结构背景。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与西方迥然不同：我们大体上形成了天、圣王、君子和小人这样社会结构层面的“差序格局”。其政治文化的根本预设是：不同的社会成员因为出身、德性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政治人格分为三六九等，其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也有所不同——因为“政治”被认为是“庙堂”之上的事情，普罗大众只是政治作用的客体，而非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政

治科学”的研究路径就大打折扣——因为它根本无法触碰真正的“政治问题”，至多只能对在政治大局主导下的某些技术性问题进行“研究”。

对此，邓正来教授和刘清平教授向施密特教授做出了进一步地补充阐释。邓正来教授指出，孙国东博士的问题指向在于西方政治科学化背后的“价值一元论”，而非政治学内部的“价值多元”假设。刘清平教授则指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实是孙国东博士所谓的“价值一元论”的主要意指所在。



施密特教授对之做出了回应。他提到，根据西方的价值传统，每一个政治活动者都是个体。这确实与东方社会截然不同。在很多亚洲社会，特别是中国，每个政治活动者都被视为社会等级秩序的一部分。儒家、道家等思想传统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种东方文化传统之下，机械地套用西方的研究工具与方法将是十分荒谬的。这就对发展新的、与西方社会不同的、适合东方社会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和工具提出了要求。

此外，围绕施密特教授的发言主题，现场的老师与同学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与看法同施密特教授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这些问题主要有：是否存在“普遍性”的政治？如果存在，这种“普遍性”的政治是否值得研究？如何理解美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多元主义追求与政治生活中的美国主体一元化倾向？应如何正确对待不同理论范式并存的局面？如何解决政治科学发展中的“美国化”危机？等等。在互动中，施密特教授强调了自己的根本立场：在世界政治科学的发展中，不同的地区应当有自己的声音与特色；并且，不同地区的政治科学之间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不是强调某种优势论，以一方压到另外一方。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本次席明纳进行了总结。他对施密特教授就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反思与批判所进行的交流与分享表示了感谢，并风趣且不失深刻地



指出：希望施密特教授下次能够与大家一起就越来越“地区化”的世界政治科学的“科学性”进行探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晨丽/文)

4.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九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2010年11月23日星期日晚上6:3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 通业大讲堂举行第九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本次读书会的阅读文本为：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读书会。



本次读书会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陈媛担任主报告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龚智慧和王中原担任主评论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博士后张瑞兰、陈乃华、博士生王升平、姚选民、李新安、硕士生杜欢，以及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陈润华博士等参加了本次读书会。



主报告人陈媛做了题为“知识生产的“理想图景”能否走出“现代化范式”？——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报告。由邓正来教授提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批判与反思的问题出发，陈媛在报告中呈现并分析了邓教授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围绕该问题“自问自答”、“自问自解”以及“自问自闷”的画面。在此基础上，陈媛阐释了其对知识生产所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力量的发挥以及邓教授所诉求的主体间性、文化间性或文明

间性是否能够超越主体的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同一性的担忧；由此，她对这一知识生产能否走出“现代化范式提出了质疑。

主评论人龚智慧做了题为“后‘范式’时代：知识将何去何从？——评陈媛《知识生产的“理想图景”能否走出‘现代化范式’？》”的报告。她认为，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邓正来教授以中国法学作为个案，指出中国法学遭遇总体性“范式”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法学论者对“现代化范式”的“前反思性接受”，其根源就在于“世界结构”对中国的强制性支配。中国要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的中国”转换，争夺“全球话语权”，就需要根据中国本身来建构“理想图景”。龚智慧提出了一系列追问：“由知识型构起来的“理想图景”，就能支撑中国的主体性吗？就能对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做出正当性评判吗？若抛却“现代化范式”，知识将何去何从？”她认为，邓正来教授后来提出的“生存性智慧”则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因为若不能说明知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正当，那么根据知识型构起来的“理想图景”只能是虚妄。



主评论人王中原做了题为“对‘思想根据’的思想——《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读后”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指出，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邓正来教授将“理想图景”引入到对中国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反思和前瞻当中，进而试图将“那个被遮蔽、被无视、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怎么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问题开放出来”。他认为，主报告人陈媛在准确抓住了邓老师的问题意识和论证思路的基础上，分别从“自问自答：“理想图景”缺失的原因；自问自解：寻找“中国主体性”；自问自问：全球化 vs 理想图景”三个方面对邓老师“理想图景问题束”当中的几个核心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进一步地，王中原从“现代性范式”的概念“偷换”、“权力”从何而生、“主体性为何”与“主体性何为”、全球化与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定义、“理想图景”的

真实身份、作为知识增量的“理想图景”等角度对陈媛的报告提出了批评性的建议。

受邓正来教授委托，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邓教授学术助手孙国东博士就主报告人和两位主评论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孙国东博士指出：主报告人陈媛对所凭借的福柯思想需做出更为深入地分析，特别是首先应当建构邓正来教授的研究路径（知识—法学路径）与福柯话语/权力理论之间的相关性，然后让邓老师与福柯进行深度对勘——否则，只能是外围的研究，甚至是“影子拳击”。

孙博士以邓老师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两个向度（国际向度与国内向度）的论说为基础指出，邓老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其实也指向了两个向度，即国际向度的全球化和国内向度的社会转型；但相对全球化和世界结构而言，邓老师关于社会转型的论说是有待进一步推进的。因此，王中原从社会转型的国内层面对邓老师展开批判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认为，王中原对主报告人“偷换‘现代性范式’的概念”的批评是不成立的。他强调：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语词本身，而是在于如何界定。关于龚智慧的主评论，孙博士主要建议她进一步建构邓老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与晚近“生存性智慧”研究之间的关系。



孙博士以邓老师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两个向度（国际向度与国内向度）的论说为基础指出，邓老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其实也指向了两个向度，即国际向度的全球化和国内向度的社会转型；但相对全球化和世界结构而言，邓老师关于社会转型的论说是有待进一步推进的。因此，王中原从社会转型的国内层面对邓老师展开批判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认为，王中原对主报告人“偷换‘现代性范式’的概念”的批评是不成立的。他强调：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语词本身，而是在于如何界定。关于龚智慧的主评论，孙博士主要建议她进一步建构邓老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与晚近“生存性智慧”研究之间的关系。

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指出，主报告人和主评论人的视角不应该只局限在邓正来教授的研究进路之内。然后，陈博士结合自身的研究背景，围绕邓正来教授所提出的中国法学的“主体性”、“理想图景”、以及“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中心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接着，姚选民、杜欢、丁轶、王升平、李新安、任崇斌等六位报告人依次做了八分钟发言。随后，大家就以下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应如何理性地对他人思

想进行批判性研究？怎样正确理解知识分子研究和民间社会的关系？如何正确地认识和使用概念、以避免误用和玩概念游戏的误区？等等。

最后，作为本次读书会的主持人兼《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作者，邓正来教授对大家的讨论与疑问做出了回应，并对本次读书会做了总结性点评。首先，他对同学们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认真阅读表示了感谢，并表示本次讨论给予了他很多意外的收获。作为对讨论的回应，邓教授指出，知识界存在着一种“不意识”的现象，这是很恐怖的，他写此书的目的正是要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样一个问题；并且，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他并非要给出一个自己的答案。邓教授提到，中国是在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要对之有一个重新、全面的认识，他提出“知识转型”、“生存性智慧”等概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最后，针对同学们在读书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邓教授提出了一点建议：不能用太概念、太技术性的方式来解读思想性的文本，不能将作者矮化为一个“工匠”；在阅读中，要学会捕捉和把握作者的问题意识，同时也要反身自问：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对于该问题作者在哪些方面没有做出回答？只有这样，才能与作者进行真正的智性交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晨丽/文)

三、学术会议

1.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开通一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0年11月6日，由《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全球化与中国模式：《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开通一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



华楼东主楼 2801 “通业大讲堂” 举行。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复旦大学宣传部部长萧思健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俞振伟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任远教授，复旦大学信息办网络中心闫华主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所长宋新宁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顾肃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孙国东博士，《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主编、复旦大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助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沈国麟博士，《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助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邓建国博士，《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复旦大学高研院林曦博士，《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助理王晨丽，《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助理龚智慧，以及来自《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翻译团队的吴万伟副教授、王小钢博士、樊安博士、杨晓畅博士、刘红雪硕士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主编、复旦大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邓正来教授首先对各位学校领导、学者嘉宾的到来表示了感谢，接着向在座的领导、嘉宾做了“《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开通一周年运行报告”。在报告中，邓正来教授对复旦大学、耶鲁大学领导的关心支持、《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成员的努力付出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指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今天的业绩正是复旦大学、耶鲁大学两校领导和编辑部成员集体努力的结晶。接着，邓正来教授就《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创立主旨、编辑部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流程、网站的内容结构、访问数量、读者来源、知名度等进行了介绍与汇报；他指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运作模式为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提供了一种典范。最后，邓正来教授提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作为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关于全球化问题双向交流的桥梁，在向中国人介绍国外关于全球化的观点的同时，也在把中国人的全球化视角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向世界。作为中国人参与全球性讨论的一个平台，《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将目标锁定为中国乃至世界

的精英受众，通过影响中国和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来影响整个世界的舆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愿意为全球化问题的全球性讨论、中华文华的世界性影响、以及人类文明在 21 世纪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从“第四届上海中国学论坛”专程赶来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开通一周年学术研讨会做了致辞。作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项目复旦大学校方的重要决策者与领导者之一，秦绍德书记介绍了《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创建和发展的背景。他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发言权、影响力在逐步增强。从外部需求来讲，各国都非常愿意了解中国。同时，作为中国自身也有必要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与模式介绍给世界，促进合作与共赢。《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顺应潮流而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秦绍德书记指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是耶鲁大学和复旦大学友好合作的产物，是在耶鲁大学校长莱文教授和复旦大学前校长王生洪教授的共同努力下酝酿、开展的。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耶鲁大学与复旦大学有一个共识：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思想观念的交流是必须的，只有交流才能理解、合作、共赢。正是基于这种共识，两校合作开设了《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这样一个窗口。秦书记表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在向国人引介西方关于全球化的声音的同时，也在努力将中国学者的成果与声音播扬到世界各国。目前，在耶鲁大学和复旦大学两校的悉心呵护之下，网站发展顺利。秦绍德书记肯定了邓正来主编领导的《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和译者团队的心血付出，代表复旦校方向《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全体成员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最后，秦绍德书记对网站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作为复旦大学参与建设的中文网站，要对国家负责，同时也要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第二，打开视野，立足中国，胸怀世界，兼容并包，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将更多国内学者的优秀成果推向世界。第三，继续发扬奋斗的精神，与耶鲁大学共同合作，将网站继续办下去、办好。



复旦大学宣传部长萧思健教授发表了重要致辞。在致辞中，他衷心祝愿《耶

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一周生日快乐”，对邓正来教授所带领的《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成员和译者团队的努力工作表示了感谢。同时，他也指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产生、良好运作与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两校的友好关系渊源密不可分，复旦大学对《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项目的发展十分重视。萧思健部长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改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情形下，引介西方的观点与经验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为了让西方了解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也要努力推介中国学者的思想与成果。《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未来发展需要依靠更多的中国学者发挥作用，复旦大学的学者当仁不让地对此有着重要的责任与义务。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在致辞中代表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对《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开通一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举行表示了祝贺，并对《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团队的努力工作与可喜成绩给予了肯定。他指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的开通与运行是复旦大学围绕“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这样一个目标而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在这项事业中，邓正来教授所带领的团队付出了很多心血，网站开通一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对知识界、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将是无可限量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俞振伟教授做了致辞。他引用 2009 年 9 月 2 日美国侨报关于《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开通的报道指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是“耶鲁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推出的”、“含有本地内容的”、“首个聚焦全球化议题的中文网络杂志”。俞振伟教授回忆了两年与耶鲁大学签订协议的细节，肯定了一年以来《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工作成效，他代表复旦新闻学院对复旦大学领导的远见卓识与兼容并包的胸怀表示了赞扬，并对邓正来教授所带领的《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编辑团队和翻译团队的努力贡献、复旦大学信息办网



络中心闫华主任对网站的大力支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俞振伟教授进一步指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推进了英语世界全球化研究的精英与华语世界知识阶层之间的相互联络。然而，与影响力的逐步扩大相关的是，我们对这个网站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够。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传递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思考与态度的网络杂志的发展现状差强人意。俞振伟教授提出，对于《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未来发展，我们应该将之提升到“以中文为工具的全球社会研究的至高点”这样一个高度上。最后，俞教授认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运作与经验，即“凝练主题、搭建平台、集合力量、扩大影响”，对今后社会科学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在学术讨论环节，在场的学者嘉宾就“全球化与中国模式”、《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可能发展方向、模式做了重要发言，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文章曾被收录在《耶鲁全球在线》(Yale Global Online)和《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作者之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对《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开通一周年表示了祝贺。他指出，这是“邓正来教授和俞振伟教授领导下的两个优势团队合作的成果”。



沈丁立教授提到，《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母体《耶鲁全球在线》(Yale Global Online)在全球学界影响力非常之大，复旦大学与之合作推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在帮助其延伸品牌的同时，对发展复旦大学的软实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沈丁立教授对《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加入中国学者全球化观版块的努力给予了肯定，并对网站的进一步推广、议题的选择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校友金灿荣教授高度赞扬了复旦大学在创办《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过程中的战略眼光与魄力。他提到，中外之间由于意识形态、文化等原因存在着认知差距（perception gap），《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正是提供了一个相互展示、相互了解的平台，在将国际视角介绍到中国的同时，也在将中国人的视角介绍给世界。这对于准确定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认清所处的国际环境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复旦大学高研院顾肃教授指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作为一个国外学术性很强的网站的中文版本，同时又包含了中国学者自己的文章，这在国内网络期刊中具有首创性。《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是一条“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针对网站的进一步发展，顾肃教授在链接推广、转载与版权标注、文章推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



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所长宋新宁教授认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这一方向上迈出了很好的一步。他指出，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角色比较特殊，经济上已经融入世界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上也比较早地融入了世界体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受益者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中心，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国外非常热门。如何让外部世界了解我们？大学在其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实践在这一方面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是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之间成功合作的一个典范,也是复旦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引进来,走出去”的一项战略。虽然目前网站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一年来的顺利推进



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任远教授认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学术样本:首先,它具有公众社会科学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网站承载的内容和编译队伍的结构上;其次,作为一个网络期刊,其影响力和运作方式与普通期刊有很大区别;再次,它将学术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重构,即通过学术机构的影响力将专家、学者的观点集聚在了网络期刊这样一个媒体之上。最后,任远教授就网站中国版块内容的选择、形成和发展复旦版特色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哈佛-燕京学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以三次访问耶鲁大学的经历阐述了耶鲁大学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和对《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合作项目的关注。曹晋教授指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成功推进表明中国正在为世界所重视、



复旦大学正在为国际所重视。《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具有开放性,它将中国学者的文章和观点放在了全球化的视野中,体现了知识的多样性和本土性,也显示了中国学者的能动性。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不平等结构中非常重要,也是中国参与世界话语权争夺的一条必然路径。结合“哈佛大学博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Harvard's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的发展案例,曹

晋教授对《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在学术参与性、互动性方面改进的可能性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会议的最后,《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主编、复旦大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再次对复旦大学校领导、复旦大学各职能部门和复旦大学信息办网络中心一年来的支持与帮助、《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和译者团队的努力工作表示了衷心地感谢。他强调,《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不仅仅是复旦大学与耶鲁大学之间的合作,也是复旦大学所代表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我们当尽全力推动网站的长远顺利发展。



又讯: 11月6日下午2:00,《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与译者团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内部讨论会,就网站一年来工作的经验、不足、改进的可能性与方式进行了总结和交流。讨论会由《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助理沈国麟博士主持,《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林曦博士,《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助理王晨丽,《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助理龚智慧,《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译者吴万伟副教授、王小钢博士、樊安博士、杨晓畅博士、刘红雪硕士参加了本次讨论会。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YaleGlobal Online Fudan Edition)由复旦大学高研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作为《[耶鲁全球在线](#)》(YaleGlobal Online)的中文版本,同时拥有中国学者论文和书评版块,亦中国大陆第一家以“全球化”为主题的中文学术网站。自2009年9月1日开通以来,《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致力于以中文为语言工具,探讨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化之间日益增强的联系,激励中文世界有关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和领域的讨论和辩论,以加深人们对全球化更深层面的理解,并且把中国人的全球化观点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向世界。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晨丽/文)

四、学术出访

1. 邓正来教授等应邀参加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高研院协办第一分会“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

2010年11月6日-7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上海社科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的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顾肃教授、陈润华博士和吴冠军博士应邀代表高研院参加了论坛。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 名学者参加了论坛。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和合共生：中国与世界融合之道”。论坛设两个圆桌会议和 8 个分会场。两个圆桌会议的主题分别是“如何认识真实的中国”和“中国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8 个分会场讨论题目包括“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中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影响”、“全球传播与中国形象”、“中国学研究的新视野”等。复旦高研院作为协办单位，与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一起主办了第一分会“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



11月6日下午，邓正来教授在主题为“如何认识真实的中国”第一圆桌会议做了题为“中国发展的哲学思考”的发言。7日上午，邓正来教授主持了第一分会“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议题一“反思中国模式之争”，并在议题二“中国模式与中国文明”中做了题为“‘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的发言。刘清平教授、顾肃教授、陈润华博士和吴冠军博士则在论坛讨论环节与发言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据悉，“世界中国学论坛”是一个高层次、全方位、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论坛旨在为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界提供对话渠道和交流平台，反映中国学研究的动态与趋势，鼓励观点创新，推动学派融合，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的中国学研究网络。论坛每两年举办一届，自 2004 年起，已成功举办三届。前三届论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精神，将“和”的理念与当代中国发展进程结合，分别以“和而不同”、“和谐和平”、“和衷共济”为主题，探究中国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认识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以及 21 世纪全球挑战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

2. 邓正来教授到常熟理工学院讲学

2010 年 11 月 9 日，应常熟理工学院邀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做客“东吴讲堂”。当日晚，邓教授为该校师生做了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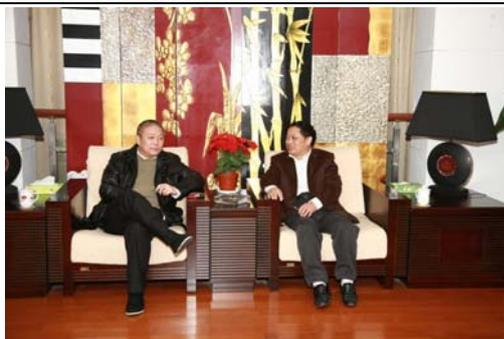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周宏教授主持讲座。复旦大学讲师、邓正来教授学术助手、高研院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社科部主任陈军博士陪同邓教授访问了常熟理工学院。



在讲座中，邓教授主要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结构之变化、中国 150 多年来的思想论争及中国 30 年来的发展经验为起点，从宏观上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着走向世界、进行中国深度研究等历史使命，批判了制约这些使命实现的唯西方化、唯学科化等倾向，并以复旦高研院为例，指出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即以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和视角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以我们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深度研究走向世界，同时推动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进而完成中国社会科学继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后真正“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

讲座开始前，常熟理工学院党委书记许霆教授会见了邓正来教授一行。双方介绍了各自单位的发展简况，主要就双方在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等方面的学术合作进行了愉快的商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



3. 邓正来教授应邀到印度讲学

2010年11月16日-21日，应印度第二大基金会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以下简称“ORF”）邀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到印度讲学。

11月18日，邓正来教授在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总部做了题为“如何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演讲。在讲座中，邓教授在回顾当下中国学界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生存性智慧”为概念工具解释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思路及要点。ORF 主席 Sunjoy Joshi 主持了讲座，来自印度、德国、英国等国的数十位学者和教授参加了讲座。

在印度访问期间，邓教授与 ORF 主席 Sunjoy Joshi、印方 ORF 副主席 Samir Saran 等学者就双方学术合作项目《中印创新、企业家精神与基层民主及治理的关系》的落实进行了具体的商谈。由双方于2010年8月签订的《中印创新、企业家精神与基层民主及治理的关系》合作项目，旨在通过中印两国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比较研究，探索“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对两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和重要作用，特别关注其与农村基层民主和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同时考虑地方性文化、人口和地缘等因素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层次影响。该研究项目将于明年正式启动，将在中印两国挑选一些有区域代表性和可比性的农村地区，就影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上述各类因素进行



实地调研和案例比较，探究一般性经验和地方特殊性，从而提出对中印两国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和具有理论意义的一般性概括。

在印度期间，邓正来教授还与印度当地学者就中印农村发展及中印法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研究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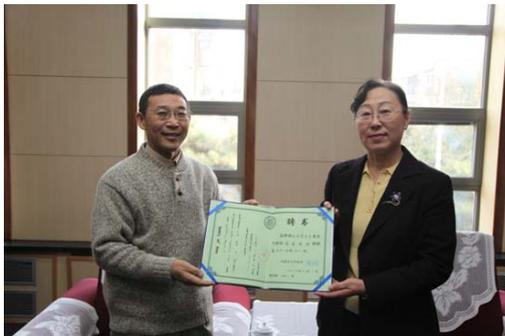
4. 纳日碧力戈教授担任 2010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主题发言评议人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承办的“2010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在北京西藏大厦召开，会期 3 天。纳日碧力戈教授担任 5 日下午大会主题发言的评议人。来自国内外的一百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出席大会的还有新京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和新浪网等媒体的代表。



5. 纳日碧力戈教授被聘为内蒙古大学客座教授并在该校进行系列演讲

2010 年 11 月 8 日，纳日碧力戈教授被聘为内蒙古大学客座教授，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刘丽华教授主持并颁发证书。校党政办公室主任铁勇、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那顺巴依尔等参加了聘请仪式。



11月8日至12日，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前沿讲座担任“语言人类学举要系列讲座”和“族群与民族的人类学研究系列讲座”的主讲。



6. 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内蒙古党校和内蒙古师范大学作专题讲座



11月11日上午，纳日碧力戈教授为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师生作专题讲座，题目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讲座中纳日碧力戈教授介绍了西方学界对于盖尔纳民族主义理论的批判：盖尔纳没有区分英式、德意式、殖民地式

和社会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忽视民族感情的作用，低估军事和政治的作用；他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民族不会寻求独立，而是要在“多元一体”的格局内互补共生，多元才能和谐。纳日碧力戈教授在讲座期间，就国内民族教育、民族语言、民族区域自治等问题，与师生们热烈互动，展开深入讨论。社会学民俗学学院院长开·巴特尔教授主持了讲座，前任院长敖其教授在座并参加讨论。

12日上午，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内蒙古党校作“国际人类学前沿研究”讲座，介绍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国家人类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讲座由内蒙古党校吉尔格勒教授主持。



7. 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广西民族大学作讲演

2010年11月29日上午9:30至11:30，应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周建新院长的邀请，纳日碧力戈教授在该院作演讲，题目是“文化多元与国家认同”。演讲由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吴国富书记主持，院长周建新教授、副院长吕俊彪教授、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壮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富强教授等师生参加了演讲会，并与纳日碧力戈教授进行了热烈的问答互动。



纳日碧力戈教授辨析了“族群”和“民族”概念的古今中外意义，提出从历史、文化、权力的角度综合观察“文化多元和国家认同”，强调在全新形势下从生命和生活层面研究人文世界的重要性。最后，他指出，多元是当下和未来世界的主流，多元与和谐并不矛盾，民族多样和国家一体也不矛盾。纳日碧力戈教授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演讲。

讲演期间，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袁鼎生教授会见了纳日碧力戈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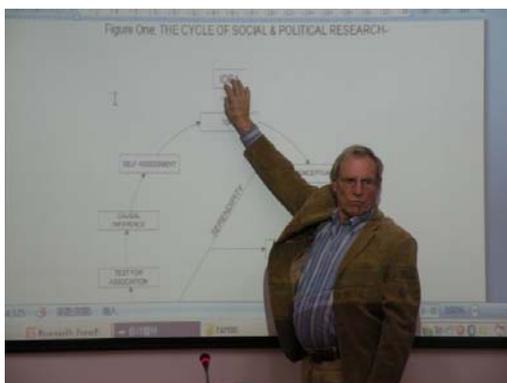
8.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在浙江大学进行学术讲座



2010年11月4日下午3:00, 高研院驻院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公共管理学院大楼107会议室为该校师生做了一场题为“民主化与国家能力”的学术讲座。这是施密特教授担任高研院驻院教授以来在国内高校巡讲的第四站。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余逊达教授担任评论嘉宾,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9.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在清华大学进行学术讲座

2010年11月15日下午3:00, 高研院驻院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在清华大学清华园熊知行楼109室为该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师生作了一场题为“民主化研究二十五年历程之反思”(Reflections on 25 Years of Studying Democratization)的学术演讲。据悉, 此次讲座是施密特教授在中国高校巡讲的第五站。



10.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访问厦门大学并进行学术讲座

2010年11月19日至21日，高研院驻院教授、国际著名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斯坦福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客座研究员、欧洲大学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教授研究员菲利普·施密特教授（Philippe Schmitter）访问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并进行了学术讲座。

施密特教授的讲座于20日晚7点在公共事务学院324室进行。本次讲座题为《当前民主政体的未来趋势》，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胡荣教授主持了该场讲座。施密特教授首先分析了当前民主政体的主要特点，然后从民主政体规模的扩大、选举权的扩展、民主议题的延伸、政治生活组织化，政治人员专业化的角度分析了已经发生的民主化浪潮。之后，他从多层次治理等角度论述了当前民主政体所面临的最新挑战。最后，教授阐述了当前民主政体的未来可能趋势。讲座结束后，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互动问答。



讲座之余施密特教授还与政治学系师生进行了座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还热情地安排了教授参观厦门多个著名景点，包括鼓浪屿、乌石浦画村、南普陀寺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施密特教授到访的第一日恰好是他的74岁生日，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胡荣教授，政治学系张光等多位教授为施密特教授点燃生日蜡烛，共同唱歌祝愿施密特教授健康长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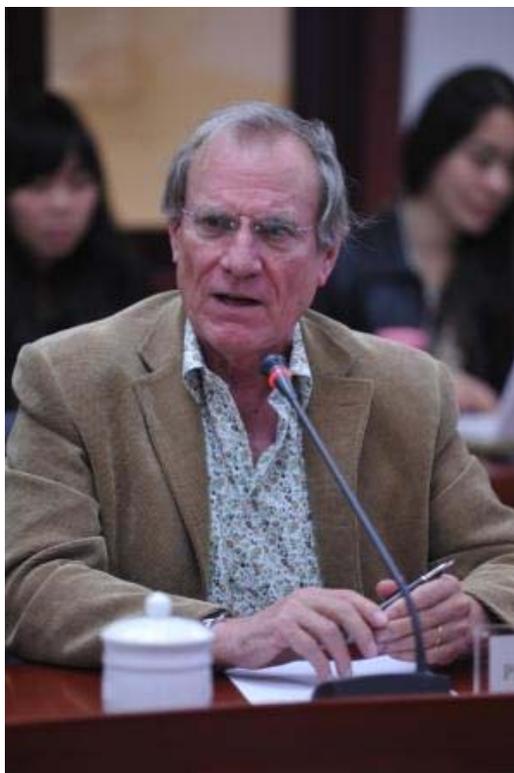


厦门大学的讲座是施密特教授担任高研院驻院教授期间在中国高校进行的第六场讲座。第七场讲座将于近日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

11.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作学术讲座

2010年11月29日，高研院驻院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作了两场学术讲座。

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的邀请，施密特教授参加了该中心主办的午餐讨论会，并以“社团主义在欧洲和中国的未来”(Observations on the Future of Corporatism in Europe with some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its Future in China)为题作了主题发言。



当天下午4:00—5:30，施密特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主办的研究讨论会系列讲座中作了题为“*What Democracy Is ... And What It Is Not*”的演讲。在演讲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在场的师生与施密特教授进行了热烈而精彩的互动。

五、学术来访

1. 福特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来访复旦高研院

2010年11月8日，福特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先生来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邓正来教授学术助手孙国东博士，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林曦博士代表高研院会见并宴请了费约翰先生。

邓正来教授向费约翰先生汇报了他主持的福特基金会项目（“中国市民社会组织：治理与管理”）的进展情况，并就中国市民社会组织发展、中国社会改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社会公平等问题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双方就学术会议、科研项目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并初步达成了进一步合作意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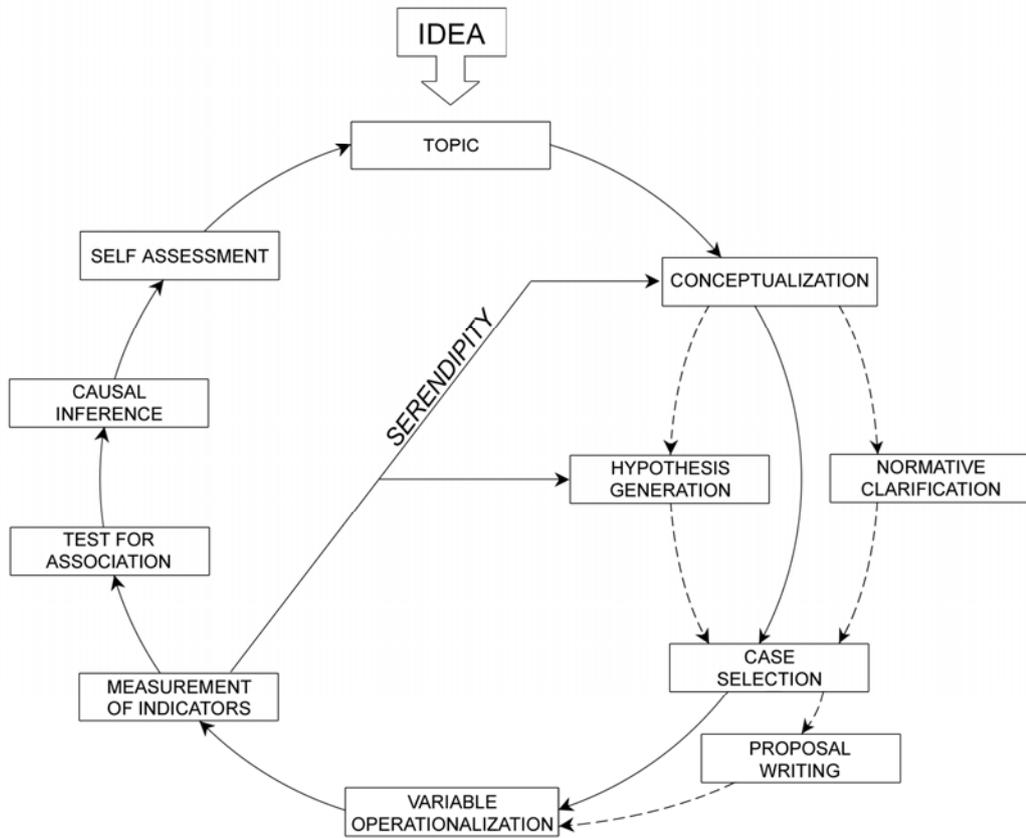


六、学术信息

1.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在复旦高研院开设“政治学研究方法”课程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教授菲利普·施密特 (Philippe Schmitter) 分别于2010年11月9日,11月16日和11月22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为复旦高研院开设“政治学研究方法”课程。此次课程分三次进行,第一节课以“研究设计:概念,主题和构思”为论题,施密特教授首先指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过程:将自己的问题和困惑转化为收集相关的有效数据来设计自己主题,然后得出一个满意的结论。然后以社会政治研究过程为例把整个研究设计的过程做出详细的解释。第二节课以“研究设计:案例选择,变量操作化和测量”为论题,施密特教授主要讲述了如何在研究假设基础上进行上述活动。教授在第三节课以“研究设计:联想,推理和批判”为论题,对指标测量、概念修正、综合分析、因果推理和论证进行解释。在讲课过程中,施密特教授经常辅以一些经典的研究实例(例如台湾的民主化),生动、系统、深入地向大家介绍了政治科学研究的一般路径和方法,并叮嘱大家在学术研究中一定要小心:“如果研究之前和研究之后的你没有任何改变,亦即所有的数据分析、因果解释都与你一开始的研究假设完全一致,那么你的研究很可能有很大问题!”。每节课教授都留出专门的时间与在场学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并建议大家在中国政治研究方面多下功夫。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中原/李新安 文)